



剑桥学派思想史

译丛

主编◎李宏图

国家与公民

States & Citizens: History, Theory, Prospects

历史·理论·展望

昆廷·斯金纳 博·斯特拉思 [主编]

彭利平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剑桥学派思想史

主编◎李宏图

国家与公民

States & Citizens: History, Theory, Prospects

历史·理论·展望

昆廷·斯金纳 博·斯特拉思 [主编]
彭利平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英)斯金纳，
(瑞典)斯特拉思著；彭利平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5

ISBN 7-5617-4511-7

I. 国… II. ①斯…②斯…③彭… III. 国家理论—研
究 IV.D0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4897 号

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

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

主 编 昆廷·斯金纳

博·斯特拉思

策划组稿 周 洁

特约编辑 洪 煜

装帧设计 卢晓红

责任出版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hdsdbook.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印刷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19.25

字 数 257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7-5617-4511-7/K·257

定 价 33.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内容简介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经常预测民族国家的消亡即将来临。但是在实践中,国家的消亡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背景下,本书就国家的观念与历史的演变、国家的理论基础以及国家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此相联的是本书还就公民与公民权利作了探讨。本书由多个国家的著名学者所撰写,从而使本书既具有历史的厚重又凸显出丰富的理论思辨,为我们理解国家与公民提供了富有多重视角。适合于历史学、政治学以及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者阅读与参考。



「中文版序言」

笔为利剑： 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主流，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被芬兰学者帕罗内称之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的革命”。^①为什么斯金纳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他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作出了什么贡献从而能够被称之为“一场革命”？

长期以来，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常常是在“哲学的”抽象层面上来展开其研究，这以美国的“历史观念史”的开创者阿瑟·洛维乔易为代表。作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②他把思想史的研究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同时重点关注于那些“经典思想家”的著作，把他们的著作看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惟一材料。于是，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斯金纳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惟一的研究对象。

针对“观念史”的研究只把研究对象定格于“伟大的经典文本”，集中于“观念的单元”这样的研究方法，斯金纳认为这是非历史的，完全抹杀了思想演进中的不断变化和无数的偶然。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③或者说“历史的”研究

① Kari Palonen: Quentin Skinner: History, Politics, Rhetoric, p1, Polity Press 2003.

② Preston King (ed): The History of Ideas: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 p8, Croom Helm 1983.

③ Norman J. Wilson: History in Crisis? Rec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ography, p75-76, Prentice Hall 1999.

方法,要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那些观念和信仰。对这一方法的特质,斯金纳自己有过言简意赅的陈述:我将“捍卫着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①

斯金纳不仅倡导着思想史研究中“历史的”方法,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政治思想从以前对内容的研究转移到对政治的论辩,从关于政治的思想转移到从政治的角度来进行思考。这种转换表明,斯金纳不把政治思想仅仅看成为一种指导政治行动的原则,而是把政治思想直接当成为政治的一种内容,或者说,政治行动本身。因为这些思想家们从来都没有只从一种抽象原则或者观念的层面上来论述他们的理论与思想,纯粹是思想观念的理论家。相反,他们都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辩论,都是为解决那个时代政治的问题如政治的合法性而在思考。或者说,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和所参与的现实政治的活动。于是,政治思想不再成为思想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抽象原则,而是直接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成为政治活动本身。这些思想家本身也就不再仅是书斋里的理论家,同时也成为了参与政治行动、分享政治权力的政治活动家。由此“思想即为行动”,“政治作为活动”成为这一研究方法的高度概括。并且,在当时的研究氛围内,这样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和对思想家的重新定位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而成为一场改变思想史研究方向的大变换。

当思想史的研究从基本的内容转向了思想的论辩,随之,斯金纳也转向将思想史上的“概念”看作为独立的实体来进行考察。这样,“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仅表明“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研究的具体化,而且意味着实现了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实质性

①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转换,实现了思想史研究从“观念史”到“概念史”的转换。从而开创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范式,同时也奠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基础”。与“观念的单元”的普遍性和反历史性相比,“概念史”则更为突出了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概念史的研究中,斯金纳并不特别重视概念在历史长时段中的变化,而是集中考察在某一特定的时段中,概念的“突然转换”。正如他自己所说:“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概念的名词包含着历史,即指这些名词的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他们的最终消失。我承认,在概念的‘命运’这类长时段的变迁并不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这里我的方法与科泽勒克和他的同事们完全不同,他们主要关注于缓慢的时间进程,而我则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①这种突然转换在斯金纳那里则意味着,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时刻相同的概念会被不同地重新定义,有些被废弃,有的却成为了主导。因此,他对概念史的考察就不再是简单地探讨概念所具有的意义,而是考察为什么这些概念会在某些时候或被废弃,或成为主导,起到占据或者控制人们观念的统治地位,并且,这些概念在被不同定义时所起到的作用。他说:“对概念史的考察并不意味着作为恢复其含义和意义的进程中的一种内容,相反,在对这每一项的研究中,我的部分目的是去显示为什么这些被质疑的概念首先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并在这个概念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方式首先成为了主导。”^②并固定下来和成为了我们通行的一种接受。他还说:“我研究概念变化不在于关注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通过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和考察他们相互关系以及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③

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已经开创了这一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着重研究近代“国家”概念的形成。后来,他继续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发表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着重考察了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新罗马理论家对“自由”概念的理解。2003年,斯金纳在《国家和公民自由》一文中又运用这种方法进一

①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ta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② 同上,第178页。

③ 同上,第4页。

步考察了“自由”概念的变化。

当从思想史转换到“概念史”后,斯金纳使用了修辞学理论来展开自己的研究,从而在思想史研究中开辟了新维度。这一新维度的中心内容即运用语言行动理论来考察概念的变化和被运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

为什么要关注语言,关注修辞,对此,斯金纳解释道:“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表达树立权威,去激发参加谈话者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他的边界,以及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①更具体地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对一些名词的修辞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和改变他的道德认同。在这之中,把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的要求描写为崇高的、友善的和值得鼓励的,而另一种行动的要求则被描写为卑劣和丑恶的。这样,所有创新性的观念思想家就面对着一个艰难的但明显是修辞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动合法化。所以,他们的任务必须是去显示为他们仿佛受到质疑的行动提供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词汇。^②他还说“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为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他们有争议的行动。”^③这样,我们看到,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任何词汇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修辞都与那个时期的政治和政治行动紧密相连。于是,斯金纳很自然地将对思想史的“概念”考察转向了对思想史的“修辞”考察,并更多地将政治思想的概念扩展到了包括“思想的行动”,即将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原则)、政治行动和修辞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

很明显,作为历史学家的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的修辞研究中受到了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影响。斯金纳特别欣赏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语言即为行动。他说:“思想史研究有两种方法,或者说语言有两种维度。第一种是被描写为意义的范围,研究词汇和语言。第二种是语言行动的维度范围,研究说话者在运用单词和句式时所能行动的范围。传统研究重视第一种,而我则关注于第二种。如果概

①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②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③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括我的研究方法的话,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语言即为行动。”^①因此,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斯金纳将修辞和概念的变化与政治行动相结合来进行研究,探讨修辞在概念的变化和政治行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就是说,我们重点要关注和考察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所用的什么修辞,即语内表现行为(illocutionary),而不是考察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期望要取得的什么效果,即语言表达效果(perlocution)。例如,考察作者利用修辞来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运用新的词汇以便创造新的概念,对词汇的重新编排以便为某种政治行为找到合法性等等。通过这一路径,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很多政治概念和政治行动,理解政治观念、原则与概念的不断演进。

斯金纳曾经这样说过语言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中重视修辞的作用,和转向修辞学的研究。“语言像其他社会权力一样自然是一种强制,它全然塑造了我们……然而,语言也是一种资源,我们能够使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笔为利剑。我们通常在实践中体现着语言并受之限制,但这些实践部分地取得其主导地位归因于我们抓住了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语言的权力。始终向我们展现的是,运用我们的语言资源来削弱或加强这些实践,也许会比我们有时设想的更自由。”^②正像著名的思想史学者詹姆士·塔利曾经以“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对政治的分析”为题,论述了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的贡献。他写道:斯金纳不仅研究了思想史和方法论,而且使用了这种方法来解读现在。斯金纳的贡献在于:解读历史的文本,考察观念的形成和变化,分析观念与其所代表的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③

在我看来,斯金纳不仅在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领域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还对思想史的意义给出了价值性的评判。斯金纳已经用上述的研究方式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会运用一定的修辞来对概念做出不同的定义和理解,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在不同的状态中、不同的时间里,我们所做出的这样一

①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同上,第7页。

③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7, Polity Press 1988.

系列选择。同样,思想史家的作用就在于从历史中挖掘出对概念的不同定义,从而有助于读者对现在的观念和信仰作出自己的判断,并留给他们去反刍。^①

在思想史研究中,斯金纳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此,无论我们是赞同还是批评,我们都需要对之作系统的了解。于是,在很多人的共同努力下,也就有了这套丛书的翻译。希望这套译丛的出版能为国内学术界了解斯金纳以及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一些学术资源,同时能推动国内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在我们所翻译的5本著作中,有1本是斯金纳自己撰写的著作《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这是斯金纳从修辞学的视角来对霍布斯的思想进行分析,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文本以及他的政治思想。其他3本是他主编的著作,这些均是从由斯金纳主编的“语境中的思想”丛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之中挑选出来的,也都体现了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了便于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斯金纳,我们特地选择了著名学者凯瑞·帕罗内所写的《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一书,这是一本对斯金纳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和高度概括的著作。总之,我们正是想通过选择这样不同类型的著作能够获得对斯金纳,这位思想史家同时也被认为是思想家的系统了解。

这些著作分别由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加丰教授、郑崧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胡传胜研究员、上海东华大学的潘兴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梅雪芹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彭利平博士、周保巍博士和我等一起翻译。在此,我作为本套译丛的主编非常感谢这些译者,他们都是我的学术同行和朋友。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了这些著作的翻译,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以至推却了很多其他的写作邀请。正是他们的热情帮助和认真的工作,才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完成。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周洁女士,她所具有的人文气质和对学术著作的关切终于使本译丛列入了出版计划,并处理了许多细节性的问题,她认真务实而又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工作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与此同时,也要

^① 详见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8页。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龚海燕女士,通过她卓有成效的工作,顺利地落实了本套丛书的版权,使我们得以展开这项学术翻译工作。在此,更应该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正是他对出版学术著作的高远视野,使这套“纯学术”译丛得以面世。

作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欧盟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支持的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研究成员,在本译丛翻译的过程中,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给予了我很多便利的工作条件,在此表示谢意。同时,本译丛也是上述研究中心科研规划中的一部分研究成果。

翻译这套丛书,还得到了很多学术同行和朋友的帮助,如现任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相蓝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童世骏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何慧敏教授和曹乃云教授;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或多或少地给了我各种类型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昆廷·斯金纳教授本人,当得知我们要翻译这样一套丛书时,他非常高兴,不仅给了我们一些学术上的指导,而且也在联系版权和其他方面都给予了具体的关心。同时,也感谢凯瑞·帕罗内(Kari Palonen)教授,在有些问题上我与他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由于所翻译的这些书都是国际一流学者的著作,因此,我们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向读者奉献较高质量的译作。当然,限于种种原因,我们可能也会犯些错误,如果是这样,只好留给学术同行们去批评指正了。

此时,我终于可以舒展一下自己了。遗憾的是,这种放松不会许久,很快我们又将要进入到新的学习与研究计划中去,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使然,实在是因为这种对未知的探索本身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和快乐。

李宏图
2005年10月



「撰稿人」

安纳贝尔·S·布雷特: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讲师;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研究员

安德鲁·多布森:英国开放大学政府和政治学系政治学教授

马丁·范·格尔德伦: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欧洲知识分子史教授

阿尔穆特·霍弗特:瑞士布鲁塞尔大学历史系早期近代史助教

卢西恩·耀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所主任、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苏迪帕塔·卡维拉贾: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政治学高级讲师

贾恩佛朗哥·波基: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政治理论教授

米歇尔·里奥特·萨塞:巴黎第八大学当代史教授

戴维·朗西曼: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学院政治理论讲师

马格努斯·瑞安: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所中世纪后期研究讲师;英国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研究员

昆廷·斯金纳:英国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研究员

博·斯特拉思: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当代史教授

朱迪思·A·维加: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哲学系社会和政治哲学讲师



「致谢」

本书来源于2000年10月在欧洲大学学院举办的一次会议。我们非常感谢安纳贝尔·布雷特和戴维·郎西曼在规划阶段所提的建议。承蒙欧洲大学学院做出了热情而友好的款待,也为会议提供了富丽堂皇的设施,我们谨表衷心感谢。我们也向西尔维·帕斯库茨在组织会议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和不知疲劳的秘书工作表示特别的感谢。对于会议讨论期间听众们所提出的问题 and 他们的参与,我们也非常感谢,正是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和他们的参与使得我们意识到需要对已涉范围进行拓展和改变。我们尤其要感谢受我们委托而答应撰写附加章节的那些作者,也对在会议上提交论文的作者们表示感谢。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他们非常愿意对文稿进行修改,有时甚至是进行彻底修改。

借此我们也向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员工表示感谢。理查德·费希尔很早就对我们的项目表示出信赖,在每个阶段都提出了极好的建议,并以极度的职业精神编辑了这本作为会议成果的书籍。同样的,我们也向出版社三名匿名审阅人表示感谢,他们每个人都提出了富有价值的建议,我们在文集中也完全体现出了他们的意见。琼·菲尔德以罕见的献身与一丝不苟的精神承担起我们的助理编辑的工作。我们也非常感谢迈克尔·利奇汇编了本书的索引。

本书的编辑分工如下:博·斯特拉思负责会议组织。对于利兹·福德姆、托马斯·乔根森和詹姆斯·凯在研究和编辑上所提供的帮助,斯特拉思表示感谢;本书

各篇论文原文是用法语提交的,利兹·福德姆将全书翻译成英文,译文出色,对此也表示格外的感谢。昆廷·斯金纳对各篇论文进行了修改,并与出版社进行了协商。他感谢利弗休姆信托基金会为他提供了重大研究基金,正是在基金资助期间本书完稿了。他也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历史学院办公室职员,尤其是乔安妮·尼科尔斯所给予的大量的重要帮助。我们两人最为感谢的是本书的撰稿人都能够及时完稿,也感谢他们能够表现出如此大的宽容和善意。

昆廷·斯金纳
博·斯特拉思